

多角度「共同研究梁啟超」——

從「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以梁啟超為例」說起

◎ 關詩珮

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5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於1998年美國加州大學舉行的「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2004) 經已出版。本文擬結合此書，一併述及整個研究計畫及研究成果。相信一直有留意梁啟超學術研究的學者，大概不會對日本原著『共同研究：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1999）¹ 及由此而翻譯的2001年中文版《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2001）感到陌生。² 讀者要留意的是，在本文最後部分談到的這本*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並不是日文版的英譯。

整個共同研究計畫，應從1993年京都說起。這個名為『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與明治日本）的計畫，由京都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主辦，在1993至1997年4年間於同地進行，召集人為狹間直樹，另外有13位日本學者及兩位歐美學者以客座身份到京都大學定期出席每月一次的研討會及學術演講，共同籌組「梁啟超的研究——以日本為媒介認識近代西方的問題」的研究課題，目的是為了探究「西方近代文明輸入中國時及中國傳統文明重新塑造的過程之中，梁啟超及明治日本所發揮的作用」。（狹間直樹2001：11）

單從參與計畫的學者名單，大概就會知道這次研究的取向及價值。日本方面，參加這個研究計畫13位學者中，有10位是京都大學出身，且多為這領域及相關議題的專家，譬如寫〈關於梁啟超師從康有為的問題〉一文的竹內弦行，就是較早發掘一個具有價值、但一直被忽視的議題「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學者；³ 而齋藤希史及狹間直樹最近曾於廣東舉行的「戊戌后康有為梁啟超與維新派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新國民之新小說——梁啟超與日本文學界」（狹間直樹）及「新國民之新小說——梁啟超與日本文學界」（齋藤希史）；⁴ 至於山田敬三對梁啟超日本政治小說研究的貢獻，更是廣為公認。⁵ 日本學者以外，就有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NRS）高級研究員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 Bergère）及美國加州大學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

這個計劃的初階進行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就是搜集及編訂梁啟超當年閱覽日文書籍及雜誌的文獻。其實，單就這一點，就足以出版一本具史學價值的資料目錄，好讓有心鑽研此題目的學者有路可循，亦能廓清一些史料上的疑竇，諸如梁氏與蘇富德峰及其他明治文人的思想淵源等。

《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全書500多頁，依次分為四個部分：「來日以前」、「思想學術」、「文學史傳」及「批評評論」。京都大學是研究文科的重鎮，尤其看重舊學功底及史料考證。本論文集史料扎實當為無疑，但在選取題材及方法論的展析上，其實也具備了一定的新鮮感，也不乏加入一些晚近的文化及文學理論，如本雅明、傅柯等的文化理論，頗能打破日本漢學研究予人的印象：只是如數家珍地臚列資料，但批判角度卻較保守。當然，運用這些理論得宜與否，有沒有成功地加強了闡釋及解釋現象的能力，還得看個人功力。

其實，著眼於研究梁啟超對「傳統中國學術終結」的採掘，已是汗牛充棟，而擲地有聲的論著也為數不少。但是，在百年多對梁氏研究的積累及沉澱後，特別在近數十年成為顯學之時，本計畫仍得以大規模舉行，研究成果仍會一本接著一本的出版。對於此，編者狹間直樹亦不諱言：「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這並不是說後人也進行了與此相符的研究。」（狹間直樹2001：5-6）可以說，「梁啟超研究」仍然「留白」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梁啟超在日本經歷的「傳統現代」、「東西」、「新舊」等等的「轉化過程」，迄今還沒有充分的掌握和真正的了解。無疑，以往很多的研究只側重於中國自清季後輸入了什麼新觀念，或者相若的觀念自晚清後如何嬗變，但卻輕視了轉變的來源及過程。

平心而論，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學者，又豈會無視明治日本，這個位於中西古今文化及時空的折射點呢？但要有心之餘還有力，又談何容易？對於很多年輕一輩的人而言，要讀梁啟超當天自詡為「平易暢達」的「新文體／新民體」，今天已大有詰屈聱牙之感；要進一步理解尚在「言文一致改革運動」雛形的日本文言，就更不是泛泛研究者能輕鬆掌的事，更不說要全面地取得日本明治時代的原始資料的困難。因此，要深入研究這一課題，由日本學者籌劃，是為理所當然。而這個計畫，就是要突出梁啟超在晚清文壇及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角色，以及為傳統中國思想學術帶來改轅易轍的影響及貢獻。因此，日文原著稱梁氏為的「轉轍手」（1999：vii），中文譯作譯此為「掌舵人」（2001：7）。事實上，梁氏於近代中國學術史上，是集引領啟航的角色「掌舵人」及轉換方向的「轉轍員」於一身。雖然國學大師（如章太炎及錢穆）都曾譏他的學問不深，學養不足；然而，從我們今天吸收西方各種學說的樣式而言，他對學術界產生「改轅易轍」的評語，也是極堪深思的。

由於梁啟超對今天定義下的各學科系及現代中國學術的影響是如此的廣泛，因此該計劃及專著所涉及的探討範圍也力求平均及全面，而且為了配合人文學科研究所舉辦的適切程度，討論的範圍都集中於人文學科以內。譬如，宗教方面有森紀子的「梁啟超的佛學與日本」、巴斯蒂的「梁啟超與宗教問題」；史學方面有竹內弘行的「關於梁啟超師從康有為的問題」及村尾進的「萬木森森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松尾洋二的「梁啟超與史傳」；文學方面齋藤希史的「近代文學觀念的形成的梁啟超」、山田敬三的「圍繞新中國未來記所見梁啟超革命與變革的思想」；社會方面有土屋英雄的「梁啟超的西洋攝取與權利——自由論」；哲學方面有末岡宏的「梁啟超與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井波陵一的「啟航的方向——關於對梁啟超的評價」；經濟方面有森時彥的「梁啟超的經濟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有石川禎浩的〈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等。

這項研究的重心，與其說是「輸入西方近代文明，重新塑造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梁啟超所發揮的作用」，無寧說是研究及重新評估「梁啟超式輸入」更為透徹。而這一點，筆者認為正是這本書跟其他同類著作最大不同之處。而且，正正是這種「梁啟超式輸入」研究模式的開創，無論在方法學上及實質的研究成果，都能帶給學術界一個全新方向，以檢視梁啟超影響下的現代學術範疇。那麼，到底什麼是「梁啟超式輸入」？

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各種西歐的現代觀念在不足50年裏急遽地湧入明治日本；中國方面，基於同樣保種求存的需要，中國知識分子以更快的速度，更囫圇吞棗的姿態吸收這些觀念。本來，這些觀念原是歷時的，且在特定的社會歷史制度環境以及一定的科技進步及物質條件下而產生出來的，它們的本質往往是充滿異質對撞的聲音，所要回應的問題也有一定的指涉。但當這些觀念輸入明治日本時，卻往往是橫斷式和壓縮型的；而輸入這些觀念的條件，除歷史偶然因素外，也有賴當時知識分子的眼光，以及他們根據日本的國情而定。梁啟超在明治日本吸收這些觀念，並反傾銷到中國時，可以說是更壓縮、更共時地輸入這些本來是歷時的觀念。而不容忽視的，是輸入者因應自己的取向加添了多一層的篩選，這既可能是因為他「不懂日語語法，可笑的誤謬甚多」，也可能是因為個人的政治議程（political agenda）（如政治小說就是一例），有意忽視這些觀念內異質的聲音。因此，重新審視一個觀念怎樣歷時地在他身上的改變，廓清他思想資源內，哪些是在日本積累，並以日本為媒介而得以完成的部分，並以此比較他怎樣按中國情況，及他個人政治因素而作的選取，然後再分析這些經歷〔西、日、中〕3種語言、2重翻譯、3種文化洗禮後的外來概念，就特別有意義了。

事實上，始作俑者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1920年）中，檢討過這種模式對中國學術的影響：「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

姑勿論這種輸入模式是正面還是負面，作為一種研究路向而言，對我們今天既要強調全球，也要強調在地思想淵源的文化交匯點上，這種方向的確可提供「辨章學術」之用。而具體地說，研究「梁啟超式輸入」的方法，可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層，是找出已有詞彙意涵的擴展及當中的差別。舉例說明，法國學者巴斯蒂在「梁啟超與宗教問題」就指出，梁啟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詞之前，筆下所用的"教"字，就一會指"思想"和教義，一會指"文明"和教化，一會又指"學術"和宗教等意思。循著這個思路及方法，我們也可以應用到梁氏鼓吹的任何一個思想觀念，特別一些在明治日本新創的新詞，或者因明治日本而得以普及的詞彙及翻譯語，如文學、哲學、國家、文明等。

第二層，是找出一個現代西歐概念傳入明治日本後所經歷的接收與轉化，特別是這種在地（local）的接收與轉化，往往是順應了日本當時的學術與政治環境，因而得以採用。這可以森紀子及森時彥的文章來說明：

森紀子的論文從佛學的角度來探討哲學與宗教之間的糾纏問題。文章提到，由於清末知識分子的大力鼓吹，佛教在中國盛極一時。但是，來到日本之後的梁啟超所依據的是井上圓了的《哲學的宗教》，梁啟超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是來自日本的研究成果。森時彥的論文論證了梁啟超在日本所吸收的經濟學說是德國歷史學派為確立國民經濟而提出的理論。梁啟超希望能突出史密斯這一人物，然而依據的卻是歷史學派的框架，所以招致了

與初衷不乎的結果，令他不得不擱筆。（狹間直樹2001:10）

當然，狹間直樹本人的「新民說略論」一文展現出，梁啟超如何以明治日本為模範，吸收公私德的概念，以模塑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的新國民的論說，也是非常精彩的。

上文說到，這次「京都共同研究」計畫有兩位外國學者參與其中，分別為巴斯蒂及傅佛果。他們回國以後，分別於1995年在法國Garchy及1998年在美國Santa Barbara分別主持及籌備了同名的研究計畫。後者的會議成果，就是*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這樣的出版模式，不是一稿兩投；跨地研究的目的，不是把研究計畫國際化而已，而是為了更好地追溯梁啟超思想的淵源。明治日本提供了一個歐美思想輸入東方社會的折射點。上文已強調，日本的文化傳統及時代因素所起的作用，絕不能輕視；然而，對來源地的參照，就更加不能忽略了。齊備了這兩個系數後，要參差比較「梁啟超式輸入」才稱得上全面。由此，我們衷心地體會到這研究計畫籌備的浩繁，參與者的殫思竭慮，這跟今天常見把學術會議或研討會變成聯誼感情呼朋喚友的學術聚餐是有多大的分別。

這本英文著述的內容分為三方面：政治、學術，以及個人與文化，另外還加入了對梁氏地理方面（石川禎浩的*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的討論及性別觀（坂元ひろ子的*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iang Qichao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Gender*）的分析。因應西方讀者不同的需要，這本英文論文集內有關明治日本的元素稍為退減，有些文章的題旨又回到梁啟超思想史的分析之上，譬如桑兵的*Japan and Liang Qichao'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Learning*一文，⁶ 明治日本的角色就退而成為背景。英文著作編者傅佛果的前言，與狹間直樹的序言不遑多樣，這正正體現了研究計畫的共識。參加這次美國會議的班底與京都的大致相同，外國的學者增添了Peter Zarrow, Don C Price, 黃克武及桑兵等幾位，而即使是參加過京都研究班的與會者，在本次的會議上大多數都是就相關的題目再縱深發揮，如齋藤希史在原著中探討了〈近代文學觀念的形成的梁啟超〉，在這本英文著作就發表了*Liang Qichao's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梁啟超的語言意識），材料雖大致相同，但探索的角度卻截然不同。

梁啟超居日14年，通過明治日本接觸到的西歐知識何其紛繁，要在一本論文集內窮盡梁氏所涉及的各個論域，誠然是不可能的。計畫籌備者狹間直樹也明言，這個計畫只希望收到「拋磚引玉」之用，發掘更多的研究方向。

因此，作為關心這個題目的研究者，便很有興趣知道是次研究計畫是如何釐訂範圍及選材，是按各研究者的興趣與能力，還是按照梁氏論述的多寡與問題的重要程度呢？不過，即使是同一範疇，筆者認為縱然本計畫已經有所觸及，將來要再探討，其實還大有空間，而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梁啟超學術研究的浩瀚及現存的空白。舉例說，齋藤希史在英文著作的文章雖以*Liang Qichao's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梁啟超的語言意識）為題，但他闡述的是梁啟超官話、廣東話及民族語言身分的形成過程。可是，明治日本對梁啟超的語言的影響更是不可忽視。我們知道，梁啟超的文體有「新文體」之譽，他在亡命日本以前的文章風格跟其後的風格顯然有別。其實，時人也早已察覺他渡日後的文風一變，謂其「偏離古文義法」，「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筆法。不過，就今天研究梁啟超新文體的現績所見，較多的是新詞彙及外來詞的研究，而有關「新文體」內的「文章句法」及「新民叢報一大特色是攫取外國語法」的「外國語法」方面，不是闕如，就是未能充分說

明「現代漢語的形成與確立，梁啟超功不可沒」的結論。在這裡，筆者嘗試作具體一點的解說，以證明這項研究其實還有很多議題可以發掘。

幕末明治時期，日本社會需要接受吸收大量的西洋事物，因而在翻譯的過程中，作為承載思想的工具——語言，無論在構詞、造句、表述方面也為之一變，加上當時傳入的西歐 rhetoric 方面的知識，⁷ 以及「言文一致」運動的展開，翻譯外國文章及小說的文體，漸漸由口語體取代文語體，特別在語尾助詞及時態動詞方面上有更明顯的改變。短語方面，譬如我們今天在漢語中常用的「換言之」，就是當時日本為了翻譯英語的「in other words」而對譯的「換言すれば」；其他如梁啟超最喜用的誇張手法如「最什麼」的句式：「此外尚多不能枚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不婚之偉人(自由書)」）「今所最可據之古籍曰」、「惟過渡時代最能感其缺乏」（史記<子墨子學說(飲冰室專集之三十七)敘論及子墨子略傳>）；「其最謹飭者」、「故具此力最大者」、「其最受歡迎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也是脫變自日語的「最も」及「元も…のひとつ」，而日語則是為了對譯「one of the …est」而來的。⁸當然，梁氏是純「吸收」還是「轉化」，還得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譬如當時的「歐文の直訳語脈（歐文直譯語法）」，與他的「和文漢讀法」有否相關？他膾炙人口的口號「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是不是就是明治文壇上的「小説は、最も上品なるもの」的中譯？而矢野龍溪提出的「漢文、和文、歐文直譯及俗語俚語」四體兼用的新文體對梁氏的影響又有多少？諸如此類的種種課題，都應由嫻熟日本語及漢語古今嬗變的研究者進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我們知道，梁啟超在人文學科以外，在科學、法律、稅務、統計學、心理、美學、教育等範圍所帶來的衝擊，都是不容忽視的。他自己闡明中國學術變遷的軌跡，就是「吾中國之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群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於歐西。而其所最缺者則格致。」他說最缺者格致外，譬如心理學一科又如何？雖然梁啟超以心理學為題的論文不多，但在那篇作為理論建構的文字的<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裏，他一再強調小說「其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感人之深」，指出小說在傳達認知經驗外還有傳達情感體驗的功能，把小說在認知、情感及審美三方面的功能聯繫在一起：「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這些觀點與明治文壇又有沒有關係？蓋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以及在很多詞彙對譯於西文相關的觀念上，也是通過明治日本導入梁啟超的思想之內的。心理學初入明治日本的學科分際時，被歸入哲學之內，留心哲學及思想觀念的梁啟超，絕對不會不注意到。這些諸如此類的題目，都有待進一步探研和深究。

我們知道，梁啟超對翻譯甚有研究，尤其是在佛學與翻譯方面；另外他自己也躬身示範翻譯的重要性，著手翻譯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然而，他自己成為翻譯研究的對象及課題，也許是始料不及的。這個共同研究計畫的模式，從構思到實踐，在為學術界做了一次非常好的示範。而以往同類的課題，都會放在史學研究之內，今次由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可說是帶領了多角度研究梁啟超的先河。事實上，廣義而言，這計畫亦是一個翻譯研究方法的示範及應用。當然，這不是傳統定義下的翻譯研究，沒有逐字逐句斟酌對比譯文與原文之別，或討論如何模仿、改編、改寫等翻譯議題，而是以文化傳播及文化逐譯為思考單位，指出翻譯活動在文化接收者（recipient）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產生的意義及影響。翻譯研究者James Holmes在1972年提出翻譯研究理論的可能性及可塑的地貌，其中一個「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方法就是扣緊翻譯在譯入語文化所發揮的功能（Function-oriented），⁹ 針對外來文本對同一文化接受者的影響，從而看到外來文化怎樣透過翻譯影響文化接收者，在文化建構或是傳統重闢方面帶來衝擊。由此可見，梁啟超作為

這個計畫的中介，在不同的範疇裏，展示了整個時代文化透譯的一個斷面。當然，要再找到好像梁啟超一樣，對各個學科都有涉獵、而且有龐大影響力的研究對象，實非易事。而這計畫，除了提供多角度研究梁啟超以外，更彰顯了真正跨文化、跨學科研究帶來的好處，而避過梁啟超自嘲的「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的文化比較學。

* 編者按，本文收到稿的日期為2005年4月。又本文實為關詩珮教授個人的創作，因為資料出錯，初刊時編者誤作二人合寫，今更正，謹向關詩珮教授及王宏志教授致歉。

註釋

- 1 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
- 2 狹間直樹主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中文版為日文版補充修訂的譯本，為方便讀者，本文述及日文版的各項內容，均引自中文版。
- 3 見竹內弦行：〈康有為『日本書目志』の一考察〉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哲學篇／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出版2003-03，77-95。
- 4 見研究論文集《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 5 在這裡只列出山田敬三幾篇相關政治小說廣為人知的著作：〈「新小説」としての「歴史小説」上、下——中國政治小説研究札記〉、〈中國政治小説の成立——その理論の比較文學的考察〉、〈漢訳『佳人奇遇』の周辺——中國政治小説研究札記〉、〈「清議報」誌上の漢訳『經國美談』——中國政治小説研究札記〉。
- 6 也可參考桑兵著：《國學與漢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77-295。
- 7 Rhetoric的日譯及中譯語「修辭」，也是明治時期取自《易經》中的「修辭立其誠」而來。
- 8 可參考鹽田良平：《日本文體に及ぼしたる西洋文體の影響》。東京：岩波書店，1932.12；或森岡 健二：《近代語の成立〈文体編〉》東京：明治書院，1969-1991.10及森岡 健二《欧文訓読の研究—欧文脈の形成》。明治書院1999。
- 9 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67-81. Amsterdam Atlanta, GA 1994.